

散 文 精 粹 藏 书 珍 品

唐宋八大家



苏 轼

览千古名句

赏万世绝唱

凭临古文极顶

俯仰天高地阔

天津人民出版社
TIANJINRENMINCHUBANSHE

唐宋八大家

苏轼

吴永哲 乔万民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八大家/乔万民主编,一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ISBN 7-201-03742-0

I. 唐... II. 乔... III. 唐宋八大家—古典散文—选集

IV. I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6186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赵明东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政编码:300020)

邮购部电话:27314360

网址:<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tjrmchbs@public.tpt.tj.cn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发行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97.375 印张

字数 1960 千字 印数 1 - 3000

定价:95.00 元

出版说明

经常阅读优秀的古文，一般会有三个层次的体验：第一层是感染于文章的气韵、风致，心神为之一爽；第二层是读后掩卷会心，觉得我们平日苦心思索、品味所得的一些理性结论，先哲早已有了详备的论述；第三层是多读细读之后，再反复咀嚼，几经出入，便如登高而望，世情、人事当中的很多道理仿佛一一陈列目前，顿感视野开阔，胸襟豁然。此外，虽时事沧桑，先哲迹远，常读其书，可以打破时空局限，如闻良师教诲，如同益友倾谈，收获与日俱增。

中国的古文从《尚书》以及先秦诸子百家开始，经两汉而发扬光大，至唐宋则诸体兼备，集其大成，八大家散文无疑是古文全盛时期的精华。所以至今学者论及古文，最推重唐宋八大家，古文选本最多的也非八大家莫属。

纵观众多选本，其中大多数是早被公认的名篇佳作，所选之精无需挑剔。但要从中完整地了解他们作品中所蕴含的思想以及艺术技巧，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把他们的作品全集拿来一一注释、解读，又未免失之繁杂、冗赘。为求其体气完备，使读者既得其精华，又可览其全貌，我们选编了这套《唐宋八大家》。为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每篇古文，编注者于每家作品选之前载其生平事迹及文学成就，在参考众家成说的基础上，力求做到脉络清晰、详略得当；之后附有史书本传，以备读者参考、辨析；在每篇之前尽可能标明写作年代，以便读者在对照其生

平事迹之后掌握文章写作的具体背景，从而更加全面、准确地理解该篇作品的思想内涵；同时附有编注者对每篇文章的概括理解，力求为读者更便捷地了解每篇作品的主题和写作技巧提供有效的导引。

在注释方面，编注者通过大量的考据工作，对每篇作品当中的生字生词予以尽可能详尽、准确地注解；对作品当中的大量典故进行了多方查证，较为详尽地标明了每条典故的出处、本意、转义以及在文中所表达的现实含义，从而使读者在准确理解作品的基础上还可借此掌握更多的典故知识。

就此而论，这应当是一套既能为一般读者了解唐宋八大家古文提供导引，也能为有志于研究唐宋八大家及其古文的学者提供一定借鉴、参考的读物。

学不可凭悟而得，气可以涵养而至。读八大家文章，不仅可以领略中华文学宝库的精华，增长知人论世的本领，养成纵贯古今的浩然之气，还可以通过充分揣摩、咀嚼其为文的章法、技巧，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相信随着读者对八大家古文涉猎深浅的不同，会得到或多或少的益处。

《唐宋八大家》编注者

于公元 2001 年元月

苏轼生平及创作简介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位旷世奇才。

苏轼的父亲苏洵，字明允，二十七岁才开始发愤读书，屡试落第后，曾愤而烧毁自己的文章，再度悉心攻读，最后，终于成为一代著名的古文家。苏轼有一个哥哥叫景先，很早就死了。他的弟弟叫苏辙，字子由，一生中苏轼荣辱与共，他们不仅是亲兄弟，也是文学上的挚友。正如苏辙所说的，苏轼对他“抚我则兄，诲我则师”（《东坡先生墓志铭》）。

苏轼一家父子三人，在文学上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后人并称他们为“三苏”。为区别起见，又分别称之为“老苏”、“大苏”、“小苏”。

苏轼八岁时入乡校读书。他的老师张易简为天庆观道士。当时学生有近百人，这位老师却单单赏识苏轼和另外一个叫陈太初的学生。那位陈太初后来成了一个怪人，也通过了科举，后来没有走仕途，却成了道人。而苏轼的一生，却与这位得道的少年同窗大相径庭，终生毁誉相伴，大起大落。

苏轼在童年就表现出了出类拔萃的文学才华。他的家乡四川眉山有一位学者名叫刘巨，当时在郡城之西寿昌院教授学生，所授至百人，苏洵命苏轼、苏辙兄弟师之。苏轼时尚幼，听刘巨赋《鹭鸶诗》最后的两句是：“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

苏轼

斜。”苏轼从旁说：“先生诗佳矣，窃疑断章无归宿，曷若‘雪片落蒹葭’乎？”刘巨听后惊说：“我怎么敢当你的老师呢？”一次，苏洵命苏轼和苏辙作《夏侯太初论》。夏侯玄字太初，是三国时魏国的重臣。当时，司马师继其父司马懿之后夺权篡政，自任大将军。夏侯玄参与了推翻司马师的密谋，不料事泄被捕。临刑前夏侯玄颜色不变，镇定自若。据《世说新语·雅量》中记载，夏侯玄这个人平时处事即镇定得出奇。一次，他倚柱作书。时大雨霹雳，破所倚柱，衣服樵燃，神色不变，书亦如故。苏轼借这段记载展开评论说：“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极力形容人们在无思想准备时的不同表现，从而盛赞夏侯玄的临死自若与他平素的处事不惊是种常人难及的雅量。这两句话，初次显露了苏轼的随机生发，翻空出奇的雄辩才能，得到了苏洵的极大赞赏。

苏轼十多岁的时候，父亲苏洵到外地求官游学，这时，他的母亲程氏为他讲授学业。程氏出身高贵，很有文化教养，十分注重对子女的早期教育，尤其注重对苏轼如何做人的教育。有一次，她给苏轼讲《后汉书·范滂传》。范滂是东汉时期的一位名士，他坚决反对当时的宦官专权误国。汉灵帝建宁二年，在宦官操纵下的朝廷大举逮捕名士党人，范滂镇定自若地前去投案，当时的一些正直官员都非常同情范滂，但亦无奈。他的老母与其诀别时说：“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李、杜都为当时名士集团的领袖人物）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苏轼母子俩讲到这儿都很激动，苏轼对母亲说：“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程氏回答：“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这种做人要讲正义、求公理的品操对苏轼很早

就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奠定了他以后一生的品行基础。

苏轼青少年，正值宋仁宗庆历年间。那时的宋仁宗正锐意改革，撤换了以吕夷简、夏竦等为代表的保守派大臣，起用了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革新派人物，政局焕然一新。当时一位叫石介的国子监直讲写了一首《庆历圣德诗》加以颂扬。苏轼常常诵习之，对韩、范、富、欧四位“人杰”产生了十分强烈的仰慕之情，立志将来也如此做人，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宋仁宗嘉祐元年，即公元 1056 年 3 月，苏轼兄弟随父亲离开老家四川眉山，赴京应考。他们从陆路走，经阆中（今四川阆中）、褒斜（今陕西勉县北），过秦岭、关中，最后于当年的五月抵达汴京。经过几个月紧张准备，同年八月苏轼、苏辙兄弟俩在开封府同时考中了进士。按照宋朝当时的规定，府试以后还要通过中央礼部（负责祭享、礼仪、贡举的机关）的考试。之后，还要由皇帝亲自主持殿试。苏轼、苏辙兄弟在开封兴国寺准备下一步的应考，而其父苏洵则投书当时在朝廷居于显位的欧阳修、富弼、韩琦等人，立刻受到赏识。到了第二年的正月，欧阳修以礼部侍郎（礼部的长官）主持考试。欧阳修为文，主张平易流畅，而对当时较为流行的奇诡艰涩的文风很不满意。所以，他主持考试，就把文风是否平易流畅作为取士的标准，苏轼的考卷《刑赏忠厚之至论》得到了欧阳修的特别赏识。据载，欧阳修看完他的文章不觉汗出，说：“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与梅圣俞》）苏轼的这篇《刑赏忠厚之至论》旁征博引，气势飞扬，但在引用的史例上，却有一则是杜撰出来的。他在文中畅言：奖赏可失之过宽，而处罚若有疑问则应慎刑，以免错杀无辜。

苏轼

在这里，他用了一则典故，说：“唐尧时代有一个人即将被判死刑。皋陶曰：‘杀之’，尧曰：‘宥之’”。这则典故用得很好，也能支持他这篇文章的论点。考官读到这则典故，不敢质疑，怕被人认为才疏学浅。苏轼过关后，有一天，考官之一的梅尧臣问他关于尧帝和皋陶的事典由何出？苏轼莞尔一笑，说是想当然杜撰出来的，他认为圣君一定会这样做。在文坛上留下了一段趣话。经过礼部的考试之后，苏轼兄弟又通过了仁宗皇帝的“御试”。苏轼赐进士及第，在三百八十位考中的学子中名列前茅；苏辙赐同进士及第。宋仁宗私下里曾高兴地对皇后说：“我为子孙得了两个‘宰相’。”

正当苏轼准备步入政坛之际，噩耗传来，苏轼的母亲程氏在家病逝，苏洵父子只好回家奔丧。

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十月，苏氏父子三人守丧完毕，带着他们的家眷举家前往京师。苏轼在第一次进京应考前，就与家乡的一位名叫王弗的女子完婚。“王弗年十六，其始，未尝自言知书，见苏轼读书，则终日不去。其后，苏轼有所忘，王弗辄能记之”。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王弗始终伴随在苏轼身边。

这次赴京，苏氏父子走的是水路，他们经现在四川境内的嘉州、泸州、渝州、涪州、忠州、夔州出了三峡，及至到今天湖北江陵时，已是岁末。一路上，他们饱览了长江上的秀丽景色，见到许多他们早已向往的名胜古迹，如屈原墓、八阵图、神女庙、昭君村、黄牛庙、虾蟆坟等，每一处山川名胜都激起了他们的诗情万千，父子三人沿路写下了不少诗歌作品。为了纪念这次长江之行，他们就把途中所作的诗一百首，编为《南行集》。这其中苏轼诗四十首，这是现存苏轼诗中最早的作品。

但严格地说，这时的苏轼诗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但苏轼在这部《南行集》的序中所写的一段话却受到后人的极大重视。这篇序文是他们父子三人到了江陵后在驿站中写的，其中说：“夫文之为文者，非能之为工，乃不能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生活是文学的源泉，优秀的文学作品，并不是“能之为”而写出来的，而是“不能之为”所写出来的。意思是作家必须深入生活，有感而发，才能写出好的作品。苏轼的这一理论贯穿了他整个一生的创作。

苏洵父子三人到达江陵后，就由水路改为陆路北上，嘉祐五年(1060)二月，抵达汴京。苏轼全家在宣秋门附近买了一套住宅安顿下来。苏轼兄弟通过了两次考试，前一次是考京师各部的公务，通过后，朝廷授苏轼河南福昌县主簿，未赴任。原因是他准备与弟弟苏辙一起参加稍后朝廷举办的“制科”考试。

在唐宋时期，朝廷除经常性地举行“进士”、“明经”类的考试外，还有一种由皇帝下诏举行的特别考试，称作“制科”。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八月，宋仁宗亲自到崇政殿策试“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苏轼考入第三等，这是一种极大的荣誉。第三等为上考，从宋初以来，被取入三等的只有吴育和苏轼，整个北宋也只有四个。这次考试之后，苏轼被授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苏辙考入了第四等，被任为商州推官。这时，苏轼的父亲苏洵也得到朝廷的任用，在京修礼书。苏辙请求朝廷后留京侍奉父亲，苏轼前往凤翔任职，苏辙送哥哥到郑州分手。第一次远离，兄弟俩都不免有些感伤。苏轼作诗一首写道：“……寒灯相对忆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

苏轼

情勿苦爱高官职！”苏轼虽然在诗中说兄弟长相守要比追求高官厚禄强，但在当时，他对仕途还是充满勃勃雄心的。

凤翔位于陕西西部，傍近渭河。陕西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整个渭河流域充满了古老的文化色彩。不过，在苏轼到任时，这里和甘肃南边逐渐兴盛起来的西夏不断发生冲突，弄得财力匮乏，民生凋敝。苏轼到任之后就遇上了一场罕见的旱灾，而求雨是地方官的事，苏轼对此表现了极大的热心。他亲自来到位于渭河南部的秦岭，爬到秦岭的最高峰太白山。那里的一座道观前有一个小池塘，据说龙王就住在那里。苏轼在那里挥笔写了一篇祈雨文，接着又到各处求雨。也许上苍为苏轼的诚心所感动吧，就在他祈雨不久，当地果然下了一场倾盆大雨，四野遍泽，民众雀跃欢呼，苏轼为此将官舍后面的亭子命名为“喜雨亭”，还写了一篇著名的碑记。

苏轼入仕之初的北宋已经出现了种种危机。面对严重的社会现实，宋仁宗于庆历三年任用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全国军事机关的副长官），提出一整套的改革方案，号称“庆历新政”。范仲淹提出了“明黜陟”、“厚农桑”、“修武备”等十项治国方案。宋仁宗采纳了他的方案，并在全中国颁行。但事隔不久，由于众多人的反对而宣告失败。范仲淹、富弼被罢去官职，韩琦放出京城，到外地任职，“庆历新政”宣告失败。而这时，王安石的变法也正在酝酿之中。

这一时期，苏轼的基本思想是要求变革，集中体现在他在考取“制科”时所写的《进策》中。《进策》是一部论文集，包括总论性质的《策略》五篇，阐述具体改革措施的《策别》十一篇，讲述对待西夏问题的《策断》三篇。另外，苏轼在凤

翔任上还著有《思治论》，也是代表他这一时期思想活动的重要著作。

在上述的这些文章中，苏轼尖锐指出现今社会远非什么太平盛世，而是存在着严重的危机。他在《策略》一文中说：“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当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胡，而内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胡不足以为中国大忧，而其动也有以召内之祸；内之民实执存亡之权而不能独起，其发也必将待外之变。”这就相当透彻地指出“内忧外患”之间的主次关系。如何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苏轼提出了一整套方案：“一曰课百官，二曰安万民，三曰厚货财，四曰训兵旅。”在这四大项总纲下面，又分别列出了一些具体措施。这些策论反映了当时苏轼积极参与政治，希图一显身手，有所做为的心态。

宋仁宗死后，英宗继位。苏轼于英宗治平元年十二月由凤翔任上返京。

新皇帝英宗久闻苏轼大名，准备破例升他为翰林，替皇帝起草诏命。当时韩琦为宰相，认为突然给苏轼以高位未必是好事，便加以反对。苏轼只好经过考试，授官直史馆（编修国史的官员）。在这个位置上，苏轼有机会看到了皇室收藏的珍本名画，感觉很满意。

这年五月，苏轼的夫人王弗去世，时年二十六岁，留下了一个六个月的儿子。苏轼与夫人王弗的感情甚深，十年后，苏轼曾写了一首词来深切怀念这位亡妻：“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

苏轼

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这首词低徊婉转，文意凄绝，为历代人所叹赏。

苏轼夫人王弗亡后的第二年，父亲苏洵又去世。苏轼与弟弟苏辙带着父亲与王弗的棺材从水路返回四川老家眉山，并在家中为父亲守丧。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苏轼守父丧毕，从老家出发赴京。从这次以后，苏轼就再也没有回到过故乡。苏轼此次到京，很快就卷入了一场激烈的党争之中，决定了他后半生的命运坎坷异常，大起大落。

这一年的二月，宋神宗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运动。王安石曾长期任地方官，在他的任职范围内曾推行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为他以后的变法做了铺垫。仁宗嘉祐三年（1058）他写下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万言奏折，系统阐述了他的变法理论和方案。神宗继位，王安石得到了重用。上任伊始，他立即组建了一个“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主持推行新法的机构。

王安石新法的具体内容大致可以分为理财和整军两个方面，有青苗法、免役法、均输法、市易法、农田水利法、将兵法、保马法、保甲法等等。王安石还大胆改革科举制，以便为他的新法提供一些他所需要的人才。

王安石变法一经推出，立刻在朝廷中引起了轩然大波。首先是欧阳修、韩琦、富弼等元老重臣站出来反对。随后，在朝廷中居有重要位置的一些人也出来反对，逐渐形成了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并得到了仁宗妻曹后，英宗妻高后，神宗妻向后的大力支持，反对派在人数上远远超过王安石的变法派。

苏轼在这时期属于反对派的骨干。

苏轼由四川守父丧返京后，担任了殿中丞、差判官诰院、权开封府推官等官职。宋神宗熙宁二年五月，苏轼写了《议学校贡举状》，反对王安石由诗赋取士改为以经义论策取士的作法。半年之后，他又写了《上神宗皇帝书》和《再上皇帝书》对王安石的新法逐一进行了驳斥。他认为新法好比“毒药”，“今日之改，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他恳请神宗要“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不要“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他劝告皇帝“自可徐徐，十年之后，何事不立？”但苏轼并非对一切新法都反对，例如他对裁减皇族恩例，勘定任子条式、修营器械、阅习鼓旗等改革措施是大力赞同的。

朝廷中激烈的变法和反变法的争斗使苏轼感到很不适应，加之有人弹劾他在守丧期间参与了贩卖私盐等事，苏轼感觉朝廷不宜久留，要求到地方任职。

苏轼在京城这一段时间里，党争激烈，使他穷于应付，在文学创作上几乎无可称道。在这二三年里，他作诗不足二十首，而且大多是应酬之作，难免泛泛平庸。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苏轼终于摆脱了党争的漩涡来到杭州任通判（知州的助理）。在杭州，他和知州陈襄的关系相处得很融洽。陈襄修复钱塘六井，解决了当地百姓饮水难的问题，苏轼就写下了《钱塘六井记》大加颂扬。常州、润州等地发生灾荒，苏轼曾前往“赈济”。临安、于潜等地出现蝗灾，苏轼也前往监督捕蝗。在与民众的接触之中，苏轼亲眼看到“王安石新法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对百姓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苏轼任通判，主要是会审判案，他知道被捕的人中，许多都是因生活所迫而违犯了新法的百姓，因而对这些犯人十

苏轼

分怜悯。他作诗写道：“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执笔对之泣，念此系中囚……我之恶薄禄，因循失归休。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谁能暂纵遣，闵然愧前修。”他给弟弟苏辙的一首诗中，更道出了他的真心话：“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蓠。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居高忘下真何益，气节消缩今无几。”

苏轼对新法感到不满，对新法带给民众的苦难又束手无策，只好移情山水，放纵冶游。在杭州的这一段时间里，苏轼写下了大量吟咏山水的名篇佳句。《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首》、《望海楼晚景五绝》、《有美堂暴雨》、《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等，都是千古传诵的名篇。

宋神宗熙宁七年，苏轼调任密州太守，到任不久就发生了严重的蝗灾，苏轼上书朝廷，恳请减免科税。他诚心诚意地斋戒吃素，为百姓乞求。由于连年饥荒，许多儿童被弃置道旁，苏轼就采取措施找人收养这些弃儿，官府每月补助这些家庭一定的粮米，这样救活了几千人。苏轼本人也曾亲自沿城墙捡回过一些孩子，每次都痛楚地洒下泪水。在密州，苏轼忙于赈灾，公事繁忙，生活清苦。看到百姓生活的惨状，苏轼深感内疚。这位饱学儒家经典的地方官发自内心地叹息道：“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肌肤，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表达了他对百姓深切的同情和深深的无奈。

苏轼的词在这一时期有了重大发展，自立门户，独创一家，初步形成了豪放的词风。

熙宁九年（1076）底，苏轼奉诏离开密州，被派往山西的河中府任职。第二年一月，他由济南进京。当时他弟弟苏辙一家就住在济南，苏轼准备顺便看望一下弟弟，不想苏辙已带着

一份重要奏折进京去了。兄弟俩终于在京城附近见了面，算来他们已有七八年没见了。他们二人在雪中畅游了几天后抵达京师。不知为什么，苏轼未被允许入京，不久，被改派为徐州太守。

徐州是一座大城，控制着山东南部的山区，这里在古时曾发生许多大的战役。苏轼到任刚刚三个月，这里就发生了大水灾，黄河在徐州以北五十里多处向东泛滥。大水到达徐州，被南面的高山挡住，水位不断上涨，最后涨到二丈八尺。苏轼后来写诗描述了当时水势浩淼的情景：“黄河西来初不觉，但讶清泗奔流浑。夜闻沙岩鸣瓮盎，晓看雪浪浮鹖鹓。”当时百姓乱作一团，而苏轼作为太守这时却表现得异常坚定。他在城上盖了棚子，几次过家门而不入，坚定地说：“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洪水围城近两个月，苏轼率领军民昼夜奋战，终于挡住了洪水，保住了徐州城。后来，朝廷下了一道公文，表彰了苏轼的功劳，并应苏轼的请求，拨款派人在徐州城东南建了一道木坝，以防水患。苏轼在这道坝上建了一座十丈高的楼台，叫“黄楼”。后来他在这里写的诗集就叫《黄楼集》。黄楼建成的那一天，举行了盛大的典礼，百姓倾城而出，苏轼与百姓共同庆贺抗洪的胜利，并写文以作纪念。苏轼在徐州任上还组织民众开发当地大量储藏的煤、铁、石灰等矿产，想方设法解除民众的贫困，他还曾亲自到监狱看犯人，并派去医生为患病的犯人进行诊治。

苏轼政绩卓著，他的名望也在不断增高。欧阳修死后，苏轼实际上已成了全国公认的第一大学者，许多颇有建树的学者都争先拜他为“师”。拜在苏轼门下的张耒、晁补之、秦观、黄庭坚被称为“苏门四学士”，后来都成了文学史上的知名人物。苏轼在淮阳结识了张耒，在杭州认识了晁补之。苏轼在徐

苏轼

州，先认识秦观，他写诗给苏轼说：“我独不愿万户侯，唯愿一识苏徐州。”他将苏轼比作“天上的麒麟”，还赞扬苏轼的为人说：“不将俗物碍天真，北斗以南能几人？”秦观是一位著名的浪漫派文人，他写的词在北宋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他一直没有科名，却赢得了许多青楼名妓的倾心赏识。据说他死后，有一些名妓还为他殉情。野史和一些传说中曾说他娶了苏轼的妹妹苏小妹，但史无明证。

苏轼的另一位门生黄庭坚博学多才，文静内向，他与秦观不同，没有亲自来见苏轼，只是写来两首小诗自荐。这两首小诗写得很谦虚，把苏轼比作崖顶的孤松，而把自己比作谷底幽草，希望自己能长到与孤松一般高。苏轼读过黄庭坚的诗，非常赏识，“以为非今世之人”。他给黄庭坚回信说：“今者辱书，执礼甚恭，如见所畏者，何哉？轼方以此求交于足下，而惧其不可得。”在后来漫长的岁月中，两人交往益深。在苏门四学士中，黄庭坚居长，时人把苏黄相提并论，但黄庭坚始终以苏轼门下士自居，后来黄庭坚成了江西诗派的鼻祖。

苏轼常以提携推选后进为己任，他在一篇书信中写道：“轼蒙庇粗遣，每念处世贫困，所向辄值墙谷，无一遂者。独于文人胜士多获所欲。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之。”意思是说，他一生到处碰壁，没有什么称心如意的事情，唯有选拔后进才是平生大快事。据《师友谈纪》中记载，苏轼对门生说：“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与主盟，则其道不坠。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昔欧阳文忠（欧阳修）常以是任付与某，故不敢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苏轼是得到恩主欧阳修赏识提拔而名闻天下的，